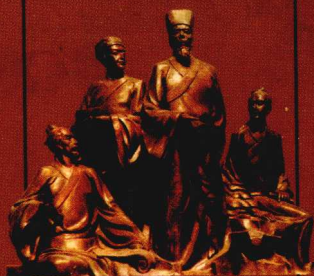


● 郭长智 著



王学圣地话王学

——
贵阳王阳明文化

● 贵州人民出版社

郭长智 著



王学圣地话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李立朴

封面设计 张世申

技术设计 张凤英

王学圣地话王学

——贵阳王阳明文化

郭长智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政编码:550001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7.375 字数 170 千

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

ISBN7-221-05046-5/B·126

定价:25.00 元

序

—

著名散文家余秋雨在《王阳明法书集》的序中写道：“倘若把中国历史上集大成式的哲学家的名单缩小到最低限度，也一定少不了王阳明（守仁）的名字。由于他的哲学思想高超、警策、简明，又由于他的人生经历曲折、奇特、宏富，他在中国文化领域的知名度是其他许多哲学家所无法比拟的。”王阳明（1472—1529年），名守仁，字伯安，浙江余姚人，学者称其为阳明先生。中国古代的哲学，发展到宋明理学，叠起了一座高峰，比之汉唐经学在理论思辨方面达到了一个更高水平，而阳明之学则是中国儒学的最后一个高峰，成为近世启蒙思想的先导，因而王阳明是“中国历史上集大成式的哲学家”。不仅仅是哲学家，他在教育上也堪称一代宗师，他重视人才，认为“今天下事势如沉痾积痿，所望起死回生者，实有在于诸君子。”他身体力行，文韬武略，卓有建树，是一位了不起的文化巨人。王士禛对阳明先生有极高评价，他说：“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，立德、立言、立功，皆居绝顶。”此即所谓“真三不朽”、“兼三不朽”。

“天下之山，萃于云贵；连亘万里，际天无极。”这是王阳明在《重修月潭寺公馆记》中赞誉贵州山势磅礴的一段话。天下的王学，无论是浙中、江右、泰州、南中、楚中、北方、粤闽诸学

派,抑或是日本的阳明学、朝鲜的实学以及东南亚及欧美的王学,寻根溯源,都以贵州为其渊藪。1996年盛夏,一批海内外学者,来到贵州高原,来到“龙场悟道,贵阳传道”的地方,参加中国贵州王阳明国际学术讨论会。会议在庄严隆重而又热烈和谐的气氛中召开,在阳明学研究史上写下了精彩的一页。会议是国际性的,说明王阳明学说产生的影响,不仅限于贵州和中国,而且远播海外。阳明学作为人类文化的瑰宝,是中国的,也是世界的,它还将对人类文明产生积极的影响。这次国际学术会议在贵阳举行,意义是重大的,犹如研究孔孟必到山东,研究二程(程颢、程颐)必到河南,研究朱熹必到江西一样,研究阳明之学,不能不到贵州。

明宣宗正德元年(1505年),兵部清吏司主事王守仁,因为戴铣、薄彦徵诸人鸣不平,言辞甚为激烈,不惟痛斥了权倾朝野的大太监刘瑾,而且触怒了至高无上的皇帝,由此惹下了一场大祸,被廷杖四十大板之后,发往贵州,谪贬为龙场(今修文县城)驿丞。次年由京城出发,盛夏来到浙江钱塘,历尽千辛万苦,过江西,越湖广,翻山越岭,长途跋涉,于正德三年(1508年)春,辗转来到贵州。

“屈原放逐,乃赋《离骚》”,王阳明谪贬贵州龙场,心学从此昌明。明清之际,阳明之学,风靡一时,李贽、黄宗羲等大家,都自认是“王学正宗”。后来扬波海外,传到朝鲜、日本、越南,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。推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诸人,也极力推崇王学。梁启超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,称王阳明“是一位豪杰之士”,认为这种新的学说,对于当时的社会,“像打药针一般,令人兴奋”,并“做五百年道学结束,吐很大光芒”。遗憾的是,人们只知王阳明生于浙江

余姚,却没有充分重视王阳明成道于贵州。其实,“龙场悟道”对阳明心学的形成实在太重要了,它奠定了王学的基石。

日本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冈田武彦夫先生,是一位研究王阳明思想而有名望的学者。他本是要来参加在贵阳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的,但因其他事务不能分身,于是便发来一封贺信。信中说:“贵州是阳明的良知之学的诞生地,修文的龙场是王阳明大彻大悟并形成思想体系的圣地。”不仅是冈田武彦夫先生,所有崇敬和研究王阳明学术思想的人,都把贵阳修文的龙场,看成是“王学圣地”。

其所以称为“圣地”,是因为王阳明学说诞生于此,并从这个原点开始,形成他的心学体系。这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,由“心即理”、“知行合一”与“致良知”等理论构筑而成。龙场大悟之后,消除了“心”与“物”二者之间的隔膜,阐发了“格物致知”的新义,第一次明确地提出“心即理”的命题,开辟了从心理层面上论述人性的蹊径。他以“心即理”为出发点,解开了“知”与“行”纠缠不清的死结,提出了“知行合一”学说。“知行合一”是“龙场悟道”的精髓,它在“心即理”与“致良知”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,走上了一条通往“良知”的道路。当然,“致良知”的论题是他后来在江西南昌才提出来的,但仔细研读他所写的《象祠记》,实际上在贵州已经萌发了这种思想。

其所以称为“圣地”,是因为王阳明学说的传播,最先是从小从贵阳开始的,贵阳是王学流传天下的始发地。阳明学术有成,于是聚徒讲学,首先创立龙冈书院,“诸生闻之,亦皆来集”,致使龙冈成为最早传习王学的地方。继而应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之请,阳明主讲贵阳文明书院,一时间,“士类感慕者云集听讲,居民环聚而观者如堵焉”,大开自由讲学之风,传播王学,

故《阳明祠碑记》写道：“明阳之学，言于天下，由贵阳始也。”《明史·儒林传》说，王阳明“门徒遍天下，流传逾百年”，然在其弟子中，最先得“知行合一”真传的弟子在贵州，他在《镇远旅邸书札》中，提到了汤伯元、陈宗鲁等 16 人。

其所以称为“圣地”，还因为以贵阳为中心分布着大量与王阳明有关的名胜古迹，要瞻仰王阳明的遗迹必到贵州。贵阳市属的修文县，是王阳明在黔遗迹最集中的地方，这里有他初至龙场读《易》的“玩易窝”，有默坐了悟的“阳明小洞天”，有龙场人民为他建造的“何陋轩”，有他自题的“君子亭”和宾至而歌的“宾阳堂”，有他创立的龙冈书院（后改为王文成公祠），还有他手植的两株古柏树，有彝族土官安国亨为他题的“阳明先生遗爱处”和蒋介石所题的“知行合一”牌匾。在修文城外西北蜈蚣坡下的“三人坟”，刻有《瘞旅文》碑记，这便是王阳明哭诉客死吏目的地方。他被收入《古文观止》的另一名篇《象祠记》也是在龙场写的，文中所说的象祠，就在与修文毗邻的黔西县境。如今修文又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阳明园，它将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王阳明学术研究中心。王阳明在贵阳讲学的文明书院，遗址尚存。贵阳扶风山麓的阳明祠是“奇秀独绝”的游览胜地，祠中有王阳明坐像及画像，以王阳明为主题的碑刻汇集于此，海内外亦属罕见。王阳明游踪所至的地方，如陆广河、木阁山、天生桥、南庵、南霁云祠、栖霞山来仙洞、易氏万卷楼、太子桥、二桥、三桥等，都在今贵阳市境。以贵阳为起点的旅游东线上，也有许多王阳明的遗迹，如玉屏山、铜鼓洞、镇远旅邸、飞云崖、月潭寺、七盘岭等等。

贵阳的王阳明文化，内涵极其丰富。来到“王学圣地”，犹如到山东瞻仰孔林、孟庙、颜庙一样，许多名胜古迹，可以引人

怀古之思,想见阳明先生当年的种种情景,想见其人、其事、其为人、其情操,想见其著述、其诗文,其高超、警策、简明的哲学思想。从学术的意义上讲,贵阳负有一个特殊的历史使命,即研究王阳明学说,贵州学术界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,不仅要广泛搜集、整理、出版有关王阳明的资料,还要深入研究王阳明的思想,包括他的哲学思想、教育思想、政治思想,特别是在“拨乱反正”之后,有必要对王阳明的思想体系重新认识。从更深的层次上讲,阳明心学为什么不产生于繁华的京城,也不产生于他自幼生长的江南水乡,而偏偏发端于僻静的贵州山区,这是一个饶有趣味而又耐人深思的问题。王学不仅最先在贵州传播,而且流传广远,在贵州形成了“王门后学”,这是以往被人们忽视甚至遗忘了的问题,也很有深入发掘的价值。

几百年来,“龙场悟道”始终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,据说仿佛是在一场大梦之后,竹子使阳明恍然大悟,豁然开朗,于是便产生了阳明心学。其实,这抹杀了心学产生的时代背景,省略了若干重大情节,留下的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。“悟道”并非凭空冥想,而是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。阳明心学,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产生于明代中叶,这是时代的呼唤,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在思想上的折光反映,是对居于“正统”地位的程朱理学的反叛和冲击,也是儒家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大发展。然而,这种新思想产生于王阳明谪贬贵州龙场期间,又有其特殊原因。王阳明在受了廷杖之后谪贬龙场,万念俱灰,唯生死一念未曾了却。在抛弃功名利禄之后,他清醒地看待现实,冷静地省度程朱理学,“仰而思焉,俯而疑焉”,终觉“支离破碎”,“学术不明”。在寂寞、苦闷、彷徨之中,他终日端居默坐,但凭自己的理解去领悟孔孟之道。这一改

变,使他跳出了引经据典、以经解经的窠臼,开始独立思考,走上了一条与朱熹不同的路。他以极大的勇气,切中理学家们坐而论道、不切实际、言行不一、口是心非的时弊,提出了“知行合一”学说,打破了思想界的沉寂,开启一代新风。当他身临绝境的时候,是龙场人民给了他生活的勇气,给了他“悟道”的灵感,使他奋然站立起来抗争,建树自己的学说。“居夷”三年,龙场人民给予他无私的援助,这种淳朴、善良的民风,与朝廷中那种尔虞我诈、勾心斗角的恶习相比,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善良的人民,纯朴的民风,使他体验到“恻隐之心”的可贵,自然而然地回复到孟子的“良知良能”说,感到只有“去私欲”才能“存天理”,于是豁然开朗,大彻大悟。在这种幽静无染的万山丛中,他深感与大自然浑然一体,“天理”与“良心”息息相通,于是得出了“圣人之心与天地万物相通”的结论,确立了“心即理”的基本立足点。由此看来,没有彼时彼刻的特殊环境,没有惨淡的人生,没有虚一而静的心态,没有龙场人民给他的灵感和宝贵的启示,就不可能有作为王学起点的“龙场悟道”。

王学一产生便在贵州传播开来,而且后继有人,出了“黔中王学”,这也不是偶然的事。从全国来看,贵州地处偏远,儒学在内地已有千年的发展,而贵州的儒学教育至明代才渐渐兴起,而且在明代前期尚不发达,因而不像其他地方那样深入人心,程朱理学在贵州造成的影响显然也小得多。正是这个程朱理学统治薄弱的地方,作为一种“异端”的王学在社会上受到的阻力也相对要少得多,以致人们很快为之倾倒,许多人成了王阳明学说的信徒。还有一点不可忽略,那就是明代中叶以后,禅宗中兴,巴蜀禅宗大盛,不少禅宗诸人来贵州传法,

明清之际达于鼎盛,这对于“援佛融道”的王学来说,也是一个有利条件,人们在受到禅学濡染的同时,很容易接受王阳明的思想。王阳明在黔期间,他的学说已经传播开来,他创立龙冈书院和主讲文明书院,培养了第一批弟子。他离开贵州以后,贵阳的王学颇盛,嘉靖十三年(1534年)黔士崇祀王阳明而建阳明书院,其后八年,即嘉靖二十一年(1542年),贵州提学副使蒋信又建正学书院,他所提倡的“正学”,就是阳明心学。王学影响逐渐扩大,在思南有王阳明再传弟子李渭主讲的为仁书院,南清平(今凯里)有王阳明再传弟子孙应鳌创建的学孔精舍,有江右王学大师邹元标主讲的都匀鹤楼书院,南皋书院也因纪念邹元标而得名。此外,崇尚王学的还有瓮安的花竹书院、铜仁的铜江书院、程番(今惠水)的中峰书院、偏桥(今施秉)的兴文书院、思南的大中书院等。

黔中王学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,因为这是一段被忽略、甚至被遗忘了的史事,在黄宗羲的《明儒学案》中只字未提,后世的研究者也不加留意,反而认为贵州是儒学的一个空白。固然在王门后学的研究上,《明儒学案》的权威性是不可否认的,但在明末清初的战乱环境中,资料缺失也在所难免。对于这点,黄氏本人也有所感触,他说:“一人之见闻有限,尚容陆续访求。”还希望“海内有斯文之责者,其不吝教我,此非末学一人之事也”。他的缺漏,他的未竟之业,责无旁贷地应由今天贵州的学术界来完成,来弥补,这也是贵阳王阳明文化独具特色的地方。发掘资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口,近年来陆续发现了许多新的资料,并提出了“黔中王门后学”的概念,这无疑是一个可喜的成绩,但还有待深入。黔中王门的特点,一是通过办学扩大王学的影响,二是在著书立说中发挥了阳明心学的

某些观点,其代表人物有孙应鳌、李渭和马延锡。孙应鳌有书传世,在《孙文恭公遗书》中,《淮海易谈》、《四书近语》、《教泰语录》等都是哲学著作,有其独到的见解,至少是一家之言。李渭、马延锡等,目前见到的材料不多,往往有目无书,或者只存一些片断。倘能深入发掘资料,加深理论研究,不但可以补史之缺,有助于研究王学在西南边疆的流传情况,而且将进一步拓宽王阳明学说的研究领域。

贵阳的王阳明文化,尽管具有区域文化的性质,但因为它处在王学形成的源头,意义非同一般,与王学由贵阳而全国,由中国而世界的传播相一致,在许多方面,它都将引起国内外的极大关注,产生较大反响。这是一笔丰厚的人文资源,而且是其他地方无法取代的文化资源,它蕴藏着无尽的宝藏,有待于进一步开发、利用。长期以来,在人们的心目中,贵州被视为“蛮荒之地”、“文化沙漠”,外界看不见贵州历史文化的风采,贵州人也自愧不如别人,无形中使外界与贵州产生了一层隔膜,障碍了贵州的进一步开放,欲变此,宣扬贵州文化,势在必行。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”,举世闻名的王阳明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来到贵州,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,闪现出人类智慧的火光,创立了一个新的学说,这是历史给贵州留下的一份珍贵的遗产,足可使天下人仰慕。要增强文化保护意识,把它提高到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,站在世纪之交,回顾历史,展望未来。如果说振兴贵州要重视经济资源的话,那么,只有当这些经济资源与人文资源相结合,才能充分发挥作用,显现出无穷的威力。如果说旅游是一种资源的话,也只有与人文资源融为一体,才能提高它的文化品位,丰富它的文化内涵。

二

近年来,王阳明学术研究在贵州兴起,取得了不少丰硕成果,使人感到欢欣鼓舞。身处“王学圣地”的贵阳,深入探讨“龙场悟道,贵阳传道”的缘由和过程,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,也是我们能独占优势的地方。但是,我们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贵州,更不能囿于贵阳,要把视野拓宽到全国和世界,看到王阳明学说产生的大背景,看到它对中国及国外产生的重大影响。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深刻理解王阳明学说的产生是顺乎历史的潮流,是历史发展的必然,是中国哲学思想演变的结果,用这样的眼光去看“龙场悟道”,去探索王阳明思想的形成,才可能深化认识,不断有新的发现。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清楚地看到王阳明学说的真正意义,它虽然以贵阳为始发点,但影响极其深远,不仅在国内风靡一时,而且流传到海外,成为东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。这种以贵阳为重点,放眼全国和世界的研究方法,既有利于深入钻研,又不至于闭门造车。事实上,只有当我们把“龙场悟道,贵阳传道”放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大范围内来作考察,研究才可能卓有成效,“王学圣地”的意义才可能凸现出来。

我们说王阳明是“中国历史上集大成式的哲学家”,决不是一句“信口开河”的话,也不是因个人偏爱而加上的溢美之词。两千多年来,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居于主导地位,对中国的政治思想、学术思想、伦理道德乃至文学艺术、教育科举都有着深刻而且深远的影响。但是,儒家思想并非一成不变,它经历了子学、经学、理学三个主要发展阶段。“子学”是指先秦时期的儒学,它在“百家争鸣”的环

境中发展起来,以孔孟之道与荀子之学为其代表,奠定了儒家学说的基础。然而到了汉代,在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的情况下,诸子之说“勿使并进”,“百家”不“鸣”了,儒家也失去了生气,从而进入了以解经、穷经为能事的“经学”阶段。不过,在经学发展的过程中,虽曰“独尊儒术”,事实上是以儒为主兼融百家,以经学的形式杂糅阴阳五行、黄老之学、刑名之学,把各家思想隐喻其中,为我所用,因而它已不是先秦儒家的本色。魏晋时期,政治动荡,战争频仍,人世沧桑,世道莫测,于是道家思想上浮,与儒家经学合流,玄学应运而生。宋明理学,把儒学理论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,即所谓“新儒学”阶段,它以“理”为本体,认识论上主张“格物”,采用新的思辨哲学“发明经旨”,融入自己的见解,“代圣人立言”,从而成为儒学发展的高级阶段。王阳明继承了陆九渊的心学,针对程朱理学的种种弊端,解决了理与气、理与心、知与行等逻辑上的矛盾,形成了“心即理”、“知行合一”与“致良知”的心学体系,又将儒学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。心学以“心”为本体,但它并不否定“理”的存在,用“心即理”的格式把两者统一起来,并通过“知行并进”以达到“致良知”的目的,“简捷易行”,学术益精,所以,尽管它是以程朱理学的“异端”出现的,但在理论上却进一步深化了理学,因而是儒学发展的最高阶段。由此可见,如果不了解儒家思想的发展演变,就事论事,把王阳明心学孤立起来,是很难理解其思想渊源的。只有当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去看待王阳明心学,我们才能认识到它在儒家学说发展中的重要地位,才会意识到王阳明是儒家学说发展长链上的一个关键人物。

但是,这样的理解是远远不够的,因为,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,它们都不是儒学单线发展的结果,而是在儒、道、佛三家长期纷争与交融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,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以儒为主、“援佛融道”。儒与道之争由来已久,春秋战国之际争论最为激烈,但儒和道毕竟都是中国土壤上生长起来的,尽管立论不同,政治主张不同,却都是中国社会孕育出来的一对孪生子,彼此有若干相通之处,所以,在往后的历史进程中相互交融贯通。先是荀子以儒容道,继是黄老之学以道兼儒,再是董仲舒以儒为本兼容百家,然后是儒道合流而为玄学。经此四次回合,思想逐渐趋于接近,彼此不再视为世仇。然而,佛教来自印度,它是一种外来文化,思想体系与文化风貌与中国完全不同,而且传入之初,中国尚无宗教。佛经又是用梵文书写,一时很难为中国人接受。后来佛教在译经的过程中,首先将梵文译成汉文,消除语言文字的隔阂。继后由中国僧人来译经,无形中又将中国人对佛经义理的理解加了进去,以便于中国人识读。佛教传入中国以后,首先与道家相互契合,一方面与玄学结合而为“佛玄”,另一方面则将道家导入宗教的轨道形成道教,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家的处世态度、思维方式较为接近,且道家在“独尊儒术”之后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而存在,被迫以宗教形式转入民间。然而,佛与儒的沟通就相当困难了,一则是儒家的“入世”态度与佛家的“出世”态度完全不相侔;二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与佛教的出家思想是相互抵触的;三是儒家的“正统”地位不容佛教相争;四是儒家“华夷大防”的思想,在民族感情和心理状态上抵制外来文化;五是佛教的许多观念和思维方式,一

时很难为儒家所接受。因此,儒、佛的斗争延续了千余年之久。儒家的反佛斗争在东晋即拉开序幕,南北朝时反神学的理论不断出现,唐代儒家的反佛情绪更加激烈。可是,经过冲突、碰撞之后,彼此了解增进,于是相向而行,佛教逐渐走向中国化,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相结合,而儒家也在反佛的过程中暗自吸收佛家思想。到了宋元时期,中外文化充分交融,在“三教圆融”的形势下,中国化程度最高的禅宗成为佛教的一大宗派,道教中以兼容儒、佛的全真教为大宗,而儒学则在“援佛融道”的基础上形成了宋明理学。程朱理学受佛教华严宗的影响最大,其次是禅宗,而陆王心学则主要受禅宗的影响。由此看来,无论是程朱理学或陆王心学,都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,都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交融的结晶,不看到这一点,就不能深入透彻地理解王阳明心学。如果从王门后学的发展看,在明代后期还与基督教有某种联系,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,他们首先学习中国文化而成“西儒”,与士大夫如徐光启、李之藻等人交往密切,在传播基督教思想的同时,也向中国人展示了西方文明,介绍西方的科学文化,令人耳目一新,更趋于“实学”。

从这里我们得到了一个重要启示,儒学在中国流传两千年而不衰,是因为它总是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嬗变。先秦诸子特别是道家使它的思想内容丰厚起来;而佛教的传入又使它产生新的冲动,给它注入了新的活力;在反佛排佛的斗争中它重新活跃起来,又在“援佛融道”的过程中形成一个新的高峰,于是产生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。当我们把王阳明心学放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来作考察,我们还会发现,它是中国人与印度人的智慧碰撞出来的火花,是中印文化交媾

的产儿,它是中国的,也是东方的,它的形成发展不能离开中外文化交流,同样,它的传播也与中外文化交流息息相关。顾炎武《日知录》说:“自弘治、正德之际,天下之士,厌常喜新,风气之变,已有其所以来。而文成以绝进之资,唱其新说,鼓动海内。嘉靖以后,从王氏而抵朱子者接踵于人间。”明代后期,王学传人遍及大江南北,以后各派又“别立宗旨”,形成浙中、江右、南中、楚中、黔中、粤闽、北方诸学派,标志着这一时期思想的活跃。明末的泰州学派更是倡导“实学”,趋于平民化,王艮、李贽等人的思想都很激进,东林党与复社深受其影响。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,如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等皆膺服王学,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的维新运动及辛亥革命。不过,这仅是对国内的深远意义而言,如果放开来,它的影响波及东方的“汉字文化圈”,在朝鲜、日本、越南都有重大影响。王阳明《传习录》刊行后不久即传入朝鲜,但因受到朱子学的压制,直到17世纪中叶以后才趋于活跃,出现了朝鲜的“阳明学”,其代表人物有郑齐斗、任圣周、崔汉绮等。大致与此同时,朝鲜又兴起一股实学思潮,讲求“穷经将以致用”,注重自然科学,主张“知行合一”,先后出现了李瀾为代表的“经世致用”派、朴趾源为代表的“利用厚生”派、金正喜为代表的“实事求是”派,丁若镛则集实学之大成。王阳明学说传入日本大概是在室町时代,最初并没有严格区分朱子与阳明的学说,到了17世纪中村藤树时才开始确立日本阳明学的理论,他们大都折中朱王,调和神道与儒学,在理论上继承“心理合一”、“知行合一”的思想,主要继承和发挥王阳明思想的积极方面,把“知行合一”引向“实行实功”,并把王阳明重实行的思想与朱熹“格物穷理”的理论结合起来,同时努力吸收西方自然科学,又

提倡自尊无畏、思想解放、追求真理、自立自强,为社会改革鸣锣开道,从而推动了“明治维新”。由此看来,王阳明心学不仅是中国的精神财富,同时也是东亚各国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。

作为人类宝贵的精神遗产,王阳明心学所关怀的是人生,是人的心灵世界,是人的道德修养和人的精神境界,这便是它能流传久远的根本原因。诚然,心学以“心”为本体,在认识论上声称“不必外求”,认为“心外无理”、“心外无事”、“心外无物”,其思想体系当然是唯心的,他所主张的“去人欲,存天理”事实上也是行不通的。但是,它所蕴含的若干积极精神却值得我们深入发掘,发扬光大。“心即理”固然在理论上把主观的“心”无限夸大而走向极端,但如果从另外一个侧面去看,它所强调的却是以人为主体的,这在某种意义上讲,含有“人本主义”思想。“心外无理”之类,似乎可以这样去理解:它重视的是自己的认识和思考,以“吾心中之理”来判断是非,而不受程朱宣扬的那种“天理”所束缚,实际上强调的是“吾心”,具有个性解放,独立思考的意识。“知行合一”反对的是坐而论道、流于空谈、口是心非、言行不一,而提倡的是心口如一、言行一致、实地用功,倡导了一种求真务实的精神,推动人们努力“践行”,去做实事,这是很可贵的。“知行合一”,既反对“茫茫荡荡悬空思索”而“全不肯着实躬行”,又反对“懵懵懂懂去做”而“全不解思索省察”,要求人们努力求知,在“行”的过程中获得“真知”,这种“求知”的精神在“知识经济”时代尤其重要。“致良知”要求人们净化心灵,发扬其“为善”的一面,抑制和克服“为恶”的一面,在心中树立起是非的标准,时常反省自己的思想、言行,这对于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。特别是在当前,“义利之争”的问题突出起来,如何处理好“义”与